

# 朱舜水(1600-1682)的抉擇與遺民心境的轉變

蔡佳琳\*

## 摘 要

長期以來，對於朱舜水的研究往往著重其思想對於日本的影響以及將其視為中日友好的見證與民族精神的表率。因此，「大儒」、「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民族英雄」等形象便成為一般人所理解的朱舜水。事實上，明亡以後，朱舜水如同許多明遺民一樣，面臨許多以生與死作開端的選擇。對於朱舜水而言，無論是死與不死、走與不走、仕與不仕，背後其實均隱含複雜且多元的原因。忠君愛國絕非是朱舜水面對抉擇時的唯一選項，中國士大夫的傳統、個人的信念等都影響了他的回應方式。

同時，身為明遺民的朱舜水，在相關研究中所描繪出的形象一直是代表孤忠、悲苦的。然而，從朱舜水的詩賦與書信中可以發現，當 1665 年，朱舜水答應水戶藩主德川光國的邀請前往江戶講學後，他的遺民生命與留在中國的明遺民有了明顯區隔。由於日本發展儒學的背景，使朱舜水在日本備受敬重，且在日本，更能讓他無顧忌地抒發對故國的思念，這使他的心境逐漸轉變，並明顯地表現在詩賦的創作上。因此，朱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所碩士生

舜水最後十七年在江戶的生活並非只有昔人所強調的悲苦、孤忠的形象，還多了見到聖道將行的喜悅以及悠然自得的遊觀之情。

關鍵詞：朱舜水、朱之瑜、明清之際、遺民、形象

## 一、前言

朱之瑜(1600-1682)，號舜水，<sup>1</sup>是明清之際東渡日本的儒者。由於他對日本江戶時期的儒學以及水戶學派產生不少影響，使他在日本受到敬重。但在中國，除了清初的邵廷采(1648-1711)等人曾為其寫傳外，並無留下太多的資料，直到清末中國人對他的所知仍是非常有限，地方志中亦無其傳。<sup>2</sup>清末民初透過駐日與留日的知識份子介紹，中國人才對他有較多的認識，梁啟超甚至稱其為「清初五大儒」之一。<sup>3</sup>這種轉變自然是與當時的時代氣氛相關。<sup>4</sup>此後中國的朱舜水研究日益蓬勃發展。直至今日，不論是在中國還是日本，關於朱舜水的研究成果其實已經相當豐碩。<sup>5</sup>但或許是由於朱

---

<sup>1</sup> 比起本名朱之瑜，朱舜水三字在歷史上更為人所知。因此本文一概以「朱舜水」稱之。

<sup>2</sup> 見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載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三冊(長沙：岳麓書社，1985)，頁668。

<sup>3</sup> 梁啟超，〈清初五大師學術梗概〉，《晨報副鐫》1923年305、306、307號，轉引自何冠彪，〈黃宗義、顧炎武、王夫之合稱清初三儒考—兼說清初四大儒及五大儒的成員〉，氏著，《明清人物與著述》(台北：台灣商務，1996)，頁61。

<sup>4</sup> 中國每當時代動亂與易代之際往往是一個對前朝遺民再發現的時刻。因此，清末也是一個宋、明遺民再發現的時期。詳見王汎森，〈歷史記憶與歷史〉，《當代》第91期(1993.11)，頁40-49。關於清末民初的朱舜水研究參見錢明，〈朱舜水事迹回傳故國考—清末民初的朱舜水熱〉，張立文、町田三郎主編，《中日文化交流的偉大使者—朱舜水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214-235、林瑛琪，〈戰前朱舜水研究：一個知識社會學的考察〉，《鵝湖》，29卷11期(2004.05)，頁15-24。

<sup>5</sup> 朱舜水研究的相關文獻可見呂玉新，〈有關朱舜水研究文獻目錄〉，《漢學研究通訊》23卷4期(2004.11)，頁21-37、徐興慶，〈朱舜水研究參考文獻〉，《新訂朱舜水集補遺》(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附錄三，頁352-393。相關文獻與研究回顧可見林俊宏，〈朱舜水在日本的活動及其貢獻研究〉(台北：秀威資訊，2004)，頁5-16、徐興慶，〈中

舜水「大儒」的身分，因此相關研究往往是從「大問題」出發。學者呂玉新指出，雖然朱舜水研究成果斐然，但研究不外乎三個主題：一是忠君愛國與尊王；二是反對摻雜佛學的宋明儒學，提倡實學；三是中日友好往來的見證。<sup>6</sup>由此可以看出，不論中、日，多數的論者多以探討朱舜水的影響力為主要的方向。

同時，朱舜水也是明朝遺民，但或許他長年寓居海外的關係，所面對的問題與在中原的遺民們不同，因此在明遺民的相關研究中，卻也很少討論過朱舜水。<sup>7</sup>所以，以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朱舜水研究與明遺民研究亦少有交集。

因此，雖然朱舜水的相關研究非常多，然而在筆者所閱讀過的研究成果中，發覺朱舜水在這些論述中的形象幾乎是單一的——強調他是孤忠的、悲苦的，終身穿戴明朝衣冠，以興復明室為念的人。筆者相信對於朱舜水而言，面對亡國之痛，拋棄妻子遠渡海外，那種心中的悲苦的確是常人所無法想像的。然而，從 1644 年明亡到 1682 年在日本辭世為止，共經歷了近四十年的時間，難道這麼長的一段時間，朱舜水完全都是這樣單一的形象？此外，朱舜水也如同多數的明遺民一樣，在明清之際面臨多次生與死的抉擇，他在面臨人生的各種際遇時，難道忠君愛國是他唯一的選擇？關於這些問題，在過去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不過，近年來已有學者注意到這樣的問題，如鄭毓瑜曾透過〈遊後樂園賦〉分析朱舜水在江戶時期的心境，作者認為賦的內容表現出一種歡欣自得之情，而朱氏在此時的心境已逐漸由「亡國遺民」到「盛世新民」。同時作者亦分析朱舜水的死與不死、仕與不仕的抉擇並非全是以「忠君愛國」為標

---

日學界朱舜水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黃俊傑編，《東亞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329-392。

<sup>6</sup> 呂玉新，〈有關朱舜水研究文獻目錄〉，頁23。

<sup>7</sup> 如在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台北：聯經，1997)一書中只有一處引用朱舜水的文字，見該書頁216-217；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三刷)中所見也僅約三處，分見該書頁229、317、322。

準。<sup>8</sup>筆者同意鄭氏的看法，也希望在此基礎上更加深入探討朱舜水身為明遺民的心境轉折。

因此，本文想先拋開朱舜水的大儒身分，而單純將他視為一個流寓海外的明遺民，透過他在人生中幾次重要的抉擇來觀察他面對這些抉擇的態度。而當他通過幾次人生的十字路口來到江戶後，其遺民心境有了什麼轉變？而轉變的關鍵又是什麼？

## 二、朱舜水生平略述

朱舜水是浙江餘姚人，初字楚璵，自從受魯王恩詔特徵後，又字魯璵。1665 年至江戶後，復以鄉里之名川「舜江(舜水)」為號。

朱舜水原為松江府儒學生，崇禎十六年(1643 年)舉恩貢生後屢受徵召，但皆不就。由於在南明弘光元年(1645 年)拒絕徵召而受到彈劾，為免被逮入獄而逃至舟山。不久，清人入關，朱舜水便長年往來於舟山、廈門、安南與日本等地進行抗清的活動，前後約 15 年。其中，魯王於監國九年(1654 年)以敕書徵召舜水，但幾經波折，敕書直到 1657 年才送至當時人在安南的舜水手中。此時朱舜水原擬夏間船往日本，再至廈門，但此時安南王為討伐國中逆賊，徵召中原識字人士幫忙寫檄文，而舜水也在薦舉之列。地方官要求舜水作詩文，但舜水因「作詩無取」而不願作詩。而後面見國王時，又因不願對安南王跪拜而險遭殺身之禍。在幾次拒絕徵召後，安南王同意其離去。<sup>9</sup>

離開安南後，朱舜水曾參與 1659 年鄭成功的北伐，失敗之後，覺得復明一时无望，又不願意進入中原接受清人統治，因此再度前往日本。由於日本當時施行鎖國政策而不願讓朱舜水在日本久

---

<sup>8</sup> 鄭毓瑜，〈流亡的風景—〈遊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漢學研究》，20卷2期(2002.12)，頁1-28。

<sup>9</sup> 關於朱舜水在安南的情況，詳見朱舜水，《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安南供役紀事〉，頁14-31。

居。但在柳川藩士安東守約(1622-1701)等人奔走下，朱舜水正式在日本寓居。1659年至1665年這段住在長崎的生活十分困苦，主要是靠安東守約以一半的俸祿來供養。1664年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國(1628-1700)遣小宅生順至長崎尋訪有學問的儒者，在這段時間小宅氏時常與朱氏筆談，並在光國的授意下，邀請舜水至江戶講學。1665年至江戶後被聘為賓師，輔佐德川光國發展儒學。1669年，亦即七十歲時曾有告老的念頭，但被光國慰留，光國並於舜水七十大壽時行養老之禮，饗舜水於水戶藩邸的小石川後樂園。1682年逝世於江戶，葬於常陸瑞龍山麓，並依據其遺願以中國式作墳題曰：「明徵君朱先生之墓」。<sup>10</sup>

朱舜水生前並未有文集刊行，目前所見文集均為後人集結而成。內容多為書簡、問答及雜著等，由於朱舜水認為「吟詩作賦，非學也」<sup>11</sup>，故其文集中少有詩賦(詳後)。因此，對於朱舜水的研究多是從這些零星的文字中尋找線索。<sup>12</sup>

### 三、山窮水盡一生與死的抉擇

#### (一)殉/不殉

明亡之後，士人普遍面臨生死出處的問題。而最先考慮的，就是要不要為明殉國。雖然，絕大多數的仍會生活下去，但總難避免想到這個問題。明亡後的朱舜水也曾面臨這樣的問題，最後他也如同多數的明朝士人選擇活了下來。不過，朱舜水不像陳確(1604-1677)等人有留下對於自身心境的具體文字敘述，所以對於為何不

<sup>10</sup> 關於朱舜水的生平可見今井弘濟、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載《朱舜水集》，頁612-624。自清末以來，論者介紹朱舜水時多是利用這篇傳記。

<sup>11</sup> 《朱舜水集》，〈與奧村庸禮書·二〉，頁257。關於朱舜水不好作詩一事亦可見安積覺，〈朱文恭遺事〉，載《朱舜水集》，頁628。

<sup>12</sup> 本文所利用的是朱謙之整理的《朱舜水集》兩冊及徐興慶根據《朱舜水集》未刊載資料而增補的《新訂朱舜水集補遺》(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殉國以及對殉國者的看法等，只能從文字的隻字片語中得到一些訊息。如在安南時，朱舜水曾表明自己因為「義不當死」，但「欲隱無所」，只好到安南避亂。<sup>13</sup>而到了日本後，又對長崎的地方官表示「家有父母未襄之事，義不得許君以死」。<sup>14</sup>最後，正式在日本寓居後，面對小宅生順的詢問，他也表明了「僕以中華穢亂，義不應死，飄零海外，已二十年。」<sup>15</sup>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朱舜水認為自己之所以不殉國，是因為「義可無死」，可是在這些文字中並未明確指出所謂的「義」指的是什麼？唯一明白指出自己何以在國亡時不死，是在回答德川光國的疑問時。那時有傳言稱朱舜水為明朝的翰林學士，朱舜水表明自己並未在明朝任官，但光國認為舜水可能有所隱瞞，因此朱舜水做了以下的表白：

若使僕二十年身受皇恩，不能與國存亡，而轉展貴國以偷生旦夕，則與犬豕何異？尚敢覲顏於上公(按：指德川光國)之廷，而視息於人世！即使僕受明朝守令微官，食明朝儋石微祿數日乎，亦不得至此矣。<sup>16</sup>

從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朱舜水認為之所以不殉國甚至輾轉來到日本，主要是因為自己從未在明朝任過任何官職。根據何冠彪的研究，明清之際士大夫曾對於未出仕者是否需要殉國有過討論，由於出仕者與未出仕者角度不同，因此當時一般人多認為殉國僅是官員的責任。而同時，由於士人們同樣要面臨忠與孝之間的抉擇，因此，明清之際有了出仕者須盡忠，未出仕者須盡孝的說法。<sup>17</sup>由此可知，朱舜水選擇不死的行動，也是符合這種思考邏輯的，以有沒有出仕來決定面對國亡時的態度。

既然自己選擇不死，那麼朱舜水對於殉國者又有何看法呢？同

<sup>13</sup> 《朱舜水集》，〈安南供役紀事〉，頁26-27。

<sup>14</sup> 《朱舜水集》，〈上長崎鎮巡揭〉，頁37。

<sup>15</sup> 《朱舜水集》，〈答小宅生順書·一〉，頁311。

<sup>16</sup> 《朱舜水集》，〈答源光國問·三〉，頁347。

<sup>17</sup> 見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頁78-79、頁116-120。

樣的，因為朱氏未留下具體的言論，不過可以在朱氏的文字中找到一些線索。

朱舜水的摯友王翊(?-1651)在魯王監國時曾舉兵響應，浙東不守後，乃入四明山寨。後清兵破四明山寨，王翊不願接受清人招降而選擇自殺殉難。<sup>18</sup>得知摯友死訊的朱舜水悲痛萬分，曾先後寫下三篇〈祭王侍郎文〉悼念友人，祭文中對王翊的忠節推崇有加。到了日本之後，對於安東守約推崇文天祥(1236-1682)的忠節，朱舜水認為比起文天祥，張世傑(?-1279)「一主死，復立一主」，不管面對多大的困境都奮戰不懈，最後「國亡與亡，終不失臣子之誼，終不使人纖毫遺貳，精忠貫日」更值得欽佩，因此稱許張世傑「誠大丈夫」。<sup>19</sup>此外，朱舜水曾前往參觀日本南北朝時期的名將楠木正成(1294-1336)之肖像，當他聽說楠木正成父子為了「興復王室」而起兵，最後因為兵敗而「從容就義」時，他為楠木正成寫下了三篇贊，稱許他「忠勇節烈，國士無雙」，同時也為正成之子楠木正行(1326-1348)寫了贊，讚許父子兩人的忠義。<sup>20</sup>

何冠彪將殉國者分為「積極進取」與「消極退縮」兩種類型，前者指的是積極與敵人奮戰到最後一刻，直到走投無路的絕境下才選擇自殺或被殺；後者指的是國亡之後隨即自殺，或是暫做觀望，發現形勢不妙後而自殺者。<sup>21</sup>從以上朱舜水極力推崇的幾位忠義之士的事蹟中可以發現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在國家面臨存亡之際時挺身而出輔佐王室，並起兵對抗敵軍直到最後一刻為止，而在確認

<sup>18</sup> 《朱舜水集》，〈祭王侍郎文·三〉，頁589。

<sup>19</sup> 《朱舜水集》，〈答安東守約書·一〉，頁171。

<sup>20</sup> 對於楠木正成的事蹟朱舜水應是聽旁人的轉述。他在文中表示「惜乎載筆者無所考信，不能發揚其盛美大德也」。-於贊中所謂的「興復王室」指的是楠木正成父子為了幫助後醍醐天皇(1288-1339)對抗足利尊氏(1305-1358，室町幕府的建立者)的大軍而起兵，兵敗之後父子均自刃。楠木正成在日本歷史上被視為智將、忠臣的代表，父子兩人分別被尊稱為「大楠公」與「小楠公」。關於朱舜水對楠木氏父子的贊，見《朱舜水集》，頁571-573。

<sup>21</sup>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頁207-210。

勢不可為時，因不願為敵人所招降或被殺而殉難，亦即朱舜水曾推崇過的殉國者均是所謂的積極殉國者。

這或許可以進一步解釋，朱舜水雖然因為未出仕明朝而選擇不殉國，但同時，他似乎也認為即使殉國也應該要選擇更有意義與價值的方式，而不是消極的殉國而已。這不但能解釋為何他選擇不死，同時也能理解為何他會在明亡之後選擇積極投入南明抗清的行動中。

## (二)走/不走

自從朱舜水因拒絕徵召而帶罪逃亡後，他就沒有再回過家鄉。而從清人入關並南下後，他更是遠走海外，沒有再踏入中國本土。關於朱舜水之所以選擇離開中原的原因，多數的相關論述中已有解釋，他跟多數的海外遺民一樣，因為「不甘薙髮從虜」而決定離開中原保全忠節。

在明清之際，許多士大夫因為不願意薙髮與易服冠曾做了許多反抗。薙髮易服不單只是外觀上的改變，頭髮與衣冠背後都具有深刻的文化意涵與象徵性，因此堅決不願薙髮易服者，除了一死了之外，許多士大夫選擇剃度為僧，邵廷采在〈明遺民所知傳〉中便稱「至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於浮屠以貞厥志。……僧之中多遺民自明季始也。」<sup>22</sup>雖然士大夫選擇遁入佛門有極複雜的因素，<sup>23</sup>然而，薙髮令的施行確實是重要的因素。除了選擇逃禪，也有不少士人會選擇遠渡海外，直接脫離清人的控制。朱舜水曾表明不願出家為僧，<sup>24</sup>因此遠渡海外便是選擇之一。

另一方面，也可以從「盡孝」的角度來觀察朱舜水的選擇。前文已提及，在明清之際已有出仕者盡忠，未出仕者盡孝的輿論出

<sup>22</sup>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明遺民所知傳〉（台北：華世，1977），頁422。

<sup>23</sup> 見廖肇亨，〈明末清初遺民逃禪之風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sup>24</sup> 在寓居長崎後，因為生活艱困，釋獨立曾勸朱舜水出家，朱氏以僧人之剃與清制之剃「蓋有類似也」因此拒絕獨立的建議。見《朱舜水集》，〈答釋獨立書〉，頁58。



現。朱舜水是未出仕者，不過舜水的父母已雙亡，因此對他來說盡孝的方法其實就是不辱父祖，也就是保存自己的頭髮衣冠。<sup>25</sup>因此，朱舜水的流寓海外也是爲了要保全「忠臣孝子之節」。<sup>26</sup>

雖然離開中原，但朱舜水並未選擇就此歸隱，反而仍積極投入抗清，希望能有所作爲。因此，此時的舜水並沒有寓居異邦的打算。然而，當舟山被清人攻陷，舜水的師友朱永祐、吳鍾巒、王翊等多因抗清失敗而殉難後，他逐漸有了寓居海外以全完節的念頭，因此在鄭成功北伐失敗後隔年，前往長崎正式定居。而朱舜水也從積極參與復明活動逐漸變成消極地等待中原恢復。<sup>27</sup>

既然選擇離開，那麼或許還要考慮的是「什麼時候要回歸？」朱舜水在七十一歲(1670年)時曾自製棺木，並「自誓非中國恢復，不歸也」<sup>28</sup>。不過，在日本渡過人生最後二十三年的朱舜水，是否曾動過回家的念頭，筆者從現存的文獻與相關研究中無法判斷。但同樣是遠渡日本的明遺民釋獨立(戴笠，1596-1672)在一次寫給朱舜水的信件中便表達出因爲生活困苦，而有了回鄉的念頭：

(獨立與逸然生活困苦)痛切兩人身居幻寄，境有餘而情不足，形苟安而心殊勞……。是今遽起回唐之心，就鄉返國以安其貧與病、寒與饑、死與埋而已，無他籌也。<sup>29</sup>

遠渡海外的明遺民，固然可以不受薙髮易服的約束，也不必面

<sup>25</sup> 《朱舜水集》，〈答源光國問先世緣由履歷〉，頁353。

<sup>26</sup> 《朱舜水集》，〈答小宅生順書·一〉，頁311。

<sup>27</sup> 一方面也由於朱舜水年紀已大，難再參與實際的抗清運動。朱氏在日本生活儉樸，曾存了三千餘金作為復明的資金，不過現存資料中似乎沒有提及他是否曾利用這些資金援助抗清的活動，反倒是在朱舜水臨死前將這些錢納入了水戶藩庫。見閔爾昌，《碑傳集補》卷三十五，〈朱之瑜〉，載《朱舜水集》，頁642。此外，到了日本後的朱舜水在文字中多次提到此生的願望便是待中原恢復時，能歸故國以修理父祖之墳。見《朱舜水集》，〈與與村庸禮書·十五〉，頁263。從朱舜水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出其雖然期待中原的恢復，但在態度與語氣上似乎已經不再如過去積極。

<sup>28</sup> 今井弘濟、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載《朱舜水集》，頁619。

<sup>29</sup> 《新訂朱舜水集補遺》，〈獨立寄朱舜水筆語〉，頁220。

對清廷徵召出仕時的各種威脅利誘，看似比居中原者來得容易守節。然而這些遺民卻也必須面對語言不通、生活窮困以及思鄉之苦等問題。

朱舜水曾在七十歲時萌告老之意，但一方面受到德川光國的慰留，一方面想到自己「思歸亦無家，與中原人居中原者不同」<sup>30</sup>，因此接受了慰留，並繼續輔佐光國直到病逝。對於朱舜水而言，不論他在日本受到多大的敬重，日本對他而言終究只是異鄉。

此外，遠渡海外看似保全了忠節，然而對朱舜水而言，心中偶爾還是有愧疚感的。如朱舜水曾對日本友人言：

敝邑遭天不造，四海陸沉。僕捐墳墓，棄妻子，漂流瑣尾，似乎欲潔其身，然衡之以大倫，玷缺多矣。<sup>31</sup>

朱舜水對於師友多已為國殉難，但自己卻拋妻棄子遠走海外仍是感到慚愧內疚的。因此，選擇活下去一方面是為了等待故國恢復以回歸家園，另一方面，則是希望透過積極的作為，使自己不枉此生。這種心境從下列這段文字中便可以明顯看出：

若使聖道得行，能為日本立萬世之功，除萬世之害，則不必急於死。若使無益於世，去其家園而徒糜日本之粟，雖百歲亦悉為？故有病聽其自生自死，不求醫服藥也。<sup>32</sup>

從以上兩節的討論中可以看見，對於朱舜水而言，自明亡以後他便不斷地尋找自己生存的意義，這其中或許也與許多明遺民一樣有著「懼死」的念頭，因此不斷替自己的生找藉口。但同時他也選擇了積極的作為以消除內心的不安。從結果論來看，或許正因為如此，使得他最後能「立功異域」吧！

<sup>30</sup> 《朱舜水集》，〈答奧村庸禮書·十二〉，頁275。

<sup>31</sup> 《朱舜水集》，〈答田犀書·一〉，頁251。

<sup>32</sup> 《新訂朱舜水集補遺》，〈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頁184。

### (三)仕/不仕

朱舜水一生雖未任明朝官職，但因為他曾受朝廷徵召的關係，因此對外均以「明徵君」自許。他在安南險些遭難時曾囑咐旁人，若一旦他遭遇不測，希望在墓碑上題上「明徵君朱某之墓」<sup>33</sup>。而在日本逝世後，德川光國等門人更是依中國式作墳題曰：「明徵君朱先生之墓」<sup>34</sup>。由此可見朱舜水視自身能受朝廷徵召為一大榮幸。然而，為何一生屢受朝廷徵召的朱舜水最後卻都選擇拒絕出仕呢？

生員出身的朱舜水早在明亡以前便因「世道日壞，國是日非」而對妻子表明「絕志於上進」的決心。<sup>35</sup>從崇禎十六年開始便屢受徵召，但皆力辭不就。其中弘光年間拒絕徵召更遭彈劾，從此遠走他鄉。他在面對德川光國詢問其先世履歷時，說出了當時的心境：

蓋之瑜少壯家修，本志功名鍾鼎，痛憤僉壬構禍，立見社稷傾頽。幸邀兩次特徵，雖百年鉅典，遠勝於科目貢舉，然傾廈非一木所支，大川豈一人攸濟！且救焚當豫籌於曲突之先，支柱必無補於棟撓之後；不得不忍情辭遜，原非欲沽名養高。<sup>36</sup>

總計在明末南明年間，大小徵召累計約有十三次，他雖有志於匡救，但因時勢不可為，因此一直到最後他都未擔任任何官職。唯一一次有意願接受徵召是在魯王監國九年(1654年)時，魯王以敕書徵召，並在書中表達此時興復明室的可能性很大，希望舜水能前往協助。然而，這封敕書一直到1657年才送到舜水的手中，他當時雖想即刻前往廈門，但卻遭安南供役事件而耽擱。事件結束後，舜水即前往廈門，這才發現人事已非，魯王早已自去監國年號(1654

<sup>33</sup> 《朱舜水集》，〈安南供役紀事〉，頁19。

<sup>34</sup> 安積覺，〈明故徵君文恭先生碑陰〉，載《朱舜水集》，頁630。

<sup>35</sup> 今井弘濟、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載《朱舜水集》，頁613。

<sup>36</sup> 《朱舜水集》，〈答源光國問先世緣由履歷〉，頁352-353。

年)且人在金門，因此未能覲見，這也是最後一次朱舜水受明室徵召。這次朱舜水之所以願意接受徵召，筆者認為一方面由於魯王詔書中提到「恢復」的可能性極大，給予朱舜水極大的信心；另一方面，身在海外的朱舜水竟能收到魯王親筆所寫的敕書，心中的感恩之情必然遠勝於其他數次徵召，因此已經十二度拒絕徵召的朱氏才有如此意願。此外，也由於這次的敕書使舜水終生感念魯王，他特別將魯王的敕書收在一個盒子中小心收藏，由此可見他對魯王之敬重。

在明亡之後，在中原受清人統治的士大夫們在生與死的抉擇後，接著要面對的就是出與處的問題。身在海外的朱舜水雖不須面對清廷的各種威脅利誘，但此時的他卻可能面對另一個問題，既然在明朝已不出仕了，那是否要出仕異邦？

朱舜水在安南面對國王檄取中原之士時，拒絕了安南王的請求。這一方面是當時舜水亟於想前往廈門與魯王會合，另一方面，則是在舜水心中安南王是個不懂禮的人。在覲見安南王時，周圍的人要求朱舜水跪拜，但舜水認為他既曾受明徵召，與一般的官員不同，因此只願作揖不願跪拜。如前所述，此事在安南引起騷動，但舜水卻覺得即使最後必須一死，也是為了守禮而死，沒什麼好遺憾的。<sup>37</sup>對於禮的堅持還可以從朱舜水與安南文官的一次筆談看出：

同時又一文官至，寫云：「太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識人事乎？」曰：「不肖寡學薄識，烏足以知天文地理？至於三才之實理實事，稍稍竊聞一二。儻大王盡禮而來教，必能佐大王國家之大務；若不循禮而強以威逼，不肖延頸待戮，更無他說也。」<sup>38</sup>

由於對守禮的堅持，使得舜水堅決不願為安南王所用，而安南王見舜水如此堅持便未再強求。

<sup>37</sup> 《朱舜水集》，〈安南供役紀事〉，頁19、〈上監國魯王謝恩奏述〉，頁31。

<sup>38</sup> 《朱舜水集》，〈安南供役紀事〉，頁21。

然而，拒絕安南王請求的舜水，卻在 18 年後答應德川光國的邀請前往江戶。若要細究其中的關鍵，則同樣可以從禮的角度來觀察。當時德川光國遣小宅生順至長崎尋訪有學問的儒士，小宅生順數次拜訪朱舜水，幾次深談之後便詢問舜水是否有意至江戶講學，舜水無法輕言答應，便回答說：

興國學事是國家大典，……。但以僕之才德菲薄，而遽足為貴國庠序之師！至若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輕言也，惟看貴國主尊意何如耳。<sup>39</sup>

1665 年德川光國確定朱舜水的學望後，正式稟明公廷，聘召至江戶講學。舜水雖未有強烈的意願，但由於門人多建議舜水東上，他終於決定前往江戶。來到江戶見到德川光國後，朱舜水與在安南一樣只願對光國作揖，但光國不以為意，仍然以禮相待，聘為賓師，希望舜水能協助日本儒學的發展。面對光國的禮遇，朱舜水心中十分感動，在他與友人的信件中，時常可以看出他對光國知遇的感謝之心，甚至認為光國的行爲有如戰國時代魏文侯之禮遇子夏：

上公相遇，禮意勤拳，雖魏文侯之於子夏，不是過也。今年五月以來，更加十倍，事物細微，雖一起一筋，亦必親自經心。恐文侯之誠懇，不能至此。諸卿大夫又能仰體盛心，更加殷勤。<sup>40</sup>

朱舜水起初寓居日本時從未想過要在日本傳播儒學，<sup>41</sup>然而面對光國的禮遇，他的想法也有了改變，如他在 1666 年寫給友人的信中便提到：

弟瑜於如許大功名大權勢，棄之如敝屣，逃之如沒溺。豈今

<sup>39</sup> 《朱舜水集》，〈答小宅生順問〉，頁411。

<sup>40</sup> 《朱舜水集》，〈與釋獨立書·三〉，頁58。

<sup>41</sup> 《朱舜水集》，〈答釋斷崖元初書〉，頁63。

墓木已拱，乃思立功異域？但遭遇如此，雖分在遠人，亦樂觀其德化之成。<sup>42</sup>

因此，對朱舜水而言，能否在異邦出仕關鍵可能在對方是否肯以禮相待。同樣的，他屢次拒絕明室各種徵召，卻有意願赴魯王之邀，也是爲了感念魯王之知遇。士大夫在面對仕與隱的問題時，常以「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爲準則。由此看來，朱舜水在他一生中面對仕與不仕的問題時，也是以此爲原則。

#### 四、柳暗花明—遺民心境的轉變

1659年決定在長崎寓居的朱舜水在此時仍是抱著亡國之痛的，這一方面是眼見十多年反清復明的努力沒有成果；另一方面，許多師友都在抗清的過程中喪生，對於已經年近六旬的舜水而言，必然有著許多感觸。而就在朱舜水打算在長崎過著歸隱生活等待中原恢復之時，小宅生順來到了長崎。從結果論來看，他選擇前往江戶是一生中最大的轉捩點。

日本的儒學長期以來便是依附在禪宗底下。儒學得以獨立以及朱子學受到尊崇，主要是受到德川幕府的極力推展。<sup>43</sup>但即使如此，朱舜水初到日本後仍然覺得此地是個儒學不振的國家。<sup>44</sup>然而，正因爲幕府以及德川光國重視儒學的結果，使得朱舜水到江戶後，面對了一個不同的環境。過去一般相關研究都是討論朱舜水對日本的影響，本文卻想從另一角度來看日本當時的時空環境帶給一個遭逢國變的明遺民怎樣的影響。

由於當時推崇儒學的關係，使得許多日本儒士對遠從中國而來的朱舜水抱持尊敬之意，且莫不希望從舜水的身上了解關於儒學的

---

<sup>42</sup> 《朱舜水集》，〈與陳遵之書〉，頁43。

<sup>43</sup> 見王家驊，《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台北：淑馨出版社，1994），頁72-83。

<sup>44</sup> 《朱舜水集》，〈與釋獨立書·三〉，頁58。

各種事物。正因如此，朱舜水在此有了可以抒發情感的對象，不論是講國變也好，講儒學也好，不同於在中國的明遺民只能透過隱喻的方式表達情感，朱舜水在日本都可以侃侃而談。而這當中，明遺民論述中常見的「衣冠」問題也是舜水常與日本儒士們討論的內容之一。

明清之際，士人爲了保全頭髮與衣冠譜出了不少「頭髮的故事」與「衣冠的故事」。<sup>45</sup>堅決反對者或以死明志，或遠渡海外，但多數人仍選擇留在中原，但頭髮與衣冠的文化意象與民族情感仍留在漢人心中，屈大均(1603-?)、陳確等人更留下不少與頭髮、衣冠相關的詩文。

朱舜水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他終身穿戴明朝衣冠，然而他所面對的情形卻與在中國的士人有些不同。身在日本的朱舜水不需要以各種隱喻的方式表達他對故國的情感，相反的，比留在中國的士人幸運的是，日本有許多儒士對明朝的服制深感興趣，時常向舜水詢問有關服制之事。如小宅生順便跟舜水提到近來日本儒風很盛，儒生們常穿著深衣、野服等，但由於國情不同，想向舜水請教可有其他製法。<sup>46</sup>後來，小宅生順更是問舜水身上所穿的是否爲明朝的儒服：

問：先生所冠所服，是貴國儒服、儒冠乎？

答：僕之冠服，終身不改。大明國有其制，不獨農、工、商不敢混冒，雖官為郡丞郡倅，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近者虜變已來，上下無等，清濁無分，工商敢服宰相之衣，吏卒得被王公之服，無敢禁之者。...僕所服者，猶是便衣；至於禮

---

<sup>45</sup> 相關研究見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第六章，〈遺民生存方式〉，頁244-313；林麗月，〈故國衣冠：鼎革易服與明清之際的遺民心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2002.06)，頁39-56。

<sup>46</sup> 《朱舜水集》，〈答小宅生順問〉，頁404。

衣，此間不便攜來，亦力不能製。<sup>47</sup>

除此之外，安東守約也曾詢問以深衣作為日本禮服的可能性。<sup>48</sup>面對安東守約對中國衣冠的仰慕，朱氏感到十分欣慰，並對守約說：「賢契生於日本，乃慕中國之制，此極美事。比之笑中國衣冠者，相去天壤。」<sup>49</sup>而德川光國更是命朱舜水製作明朝衣冠以為參考。<sup>50</sup>面對這些對於服制的詢問，朱舜水曾寫下〈深衣議〉表達自己對深衣的看法，他認為服制之事還是要依各國的情形而定，但「使學士大夫得服深衣，誠為雅適，拱揖瞻如，饒有體貌。不獨士大夫，及后、王、君、公，無不宜也」<sup>51</sup>。這比起清初時黃宗羲作〈深衣考〉時背後可能蘊含的複雜動機，<sup>52</sup>朱舜水作〈深衣議〉似乎單純許多，只是回答日本儒士們的疑問。由此可見，朱舜水不僅可以身著明朝衣冠表達其對故國之思，在日本他更有可能將這種思念轉化為具體行動，使故國的事物流傳海外。

除了在日本受到禮遇外，來到江戶的朱舜水看到自己的努力漸漸有了成果，日本的儒學慢慢推展開來，自然也讓他的心情有了轉變。他曾對友人表示如果德川光國生在中國，並有名賢輔佐的話，必然是位賢君。<sup>53</sup>他也曾感慨自己未能親見孔子理想中的大同之世，但此時卻覺得「近世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為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為易。<sup>54</sup>」來到江戶數年後，舜水也漸漸流露出看到聖道將行的喜悅：

今上公種種明德，直可邁越古來哲王。……。王道之行，於

<sup>47</sup> 《朱舜水集》，〈答小宅生順問〉，頁407-408。

<sup>48</sup> 《新訂朱舜水集補遺》，〈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頁207。

<sup>49</sup> 《新訂朱舜水集補遺》，〈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頁282。

<sup>50</sup> 今井弘濟、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載《朱舜水集》，頁620。

<sup>51</sup> 《朱舜水集》，〈深衣議〉，頁461。

<sup>52</sup> 見林麗月，〈故國衣冠：鼎革易服與明清之際的遺民心態〉，頁45-46。

<sup>53</sup> 《朱舜水集》，〈與陳遵之書〉，頁41。

<sup>54</sup> 《朱舜水集》，〈元旦賀源光國書〉，頁113。



今見之，此政台臺紀會之時也。惟冀共為敦勉，力襄至治。必期成貴國無前之美，必期為王者之法，方愜鄙懷。……。僕雖衰朽遠人，蒙上公破格隆禮，亦扶杖而觀童叟之舞，可藉手以雪胸中憤悶。<sup>55</sup>

正因為德川光國的知遇與當時日本極力發展儒學的背景使舜水接受了邀請來到江戶，同時也正因為這樣的背景，使朱舜水身為明遺民的心境也有了改變。而這種轉變除了從他寫給友人的信件與問答中可以看出，也可以從他的詩賦中窺見一二。

前文提及舜水少作詩賦，也因此過去很少針對其詩賦進行研究。<sup>56</sup>然而正是因為朱舜水很少吟詩作賦，因此探究他為何在某時某地有詩賦之作其實是饒富意義的，雖然資料有限，但從詩賦中也可以發現朱舜水心境的轉變。

朱舜水的詩大多是作於明亡以後往來舟山、安南、日本等地時。其中有 15 首合稱為《泊舟稿》，曾收在張廷枚所輯《國朝姚江詩存》中，這也是朱舜水的詩文中唯一留在中國者。其中的〈遊仙詩〉十二首，應是藉追憶古事以表達心中對故國之感觸。此外，在原念齋(1774-1820)所撰的朱舜水傳中，則錄有兩首，分別作於安南與日本。試舉此時所作之詩兩首為例，一首是寫漢張良的事蹟：

子房瀟灑人，早歲友黃綺。自見長桑君，慷慨念國恥。吁嗟一擊誤，飛迹千里徙。浮沉閭黨間，潛踪尤詭譎。故人采紫芝，匿影空山裡。故使圯下翁，脫屣示深旨。嚴霜下五更，

<sup>55</sup> 《朱舜水集》，〈答野傳書〉，頁246-247。

<sup>56</sup> 正因為朱舜水認為「作詩無取」，故整體來說，相關的研究成果多半強調朱舜水的實學思想，詩賦內容便不是學者討論的重點。詳見郭垣，《朱舜水》(台北：正中書局，1964)，頁49-51、王進祥，《朱舜水評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頁130-131、朱力行，《朱舜水的一生》(台北：世界書局，1982)，頁93-94、黃源典，《朱舜水及其學術思想》(台北：東大，1991)、陶清，〈朱之瑜的實學思想與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氏著《明遺民九大家哲學思想研究》(台北：洪業，1997)，頁687-741。在這些著作中，學者多只討論朱舜水對詩賦的態度，而不討論他所寫的詩賦內容及其背後可能蘊藏的意涵。

對語興亡語。際會及風雲，婉嬗出餘技。俛仰思舊遊，浩然不可止。不師黃石公，去從赤松子。<sup>57</sup>

曾有人評舜水之詩爲「寄旨深遙，含情幽怨」並要讀者「當索之於言外」。<sup>58</sup>因此這首詩表面上看似追憶張良的事蹟，但從當時的背景與內容來看，多少也反映了朱舜水在國亡之後的遭遇。另一首則是作於日本，寫出獨自身在異邦遙望故國的感情：

九州如瓦解，忠信苟偷生。受詔蒙塵際，晦跡到東瀛。回天謀未就，長星夜夜明。單身寄孤島，抱節比田橫。已聞鼎命變，西望獨吞聲。<sup>59</sup>

此時朱舜水所作之詩，內容多是悲苦、感傷，不是表現亡國之痛，便是追悼念故友，或是表明心跡等。

至於正式寓居日本以後，朱舜水幾乎沒有留下詩作，然而，就在他將離開長崎前往江戶的前夕，他寫下兩首七言絕句向友人琴山井辭別：

避亂安南漲海隈，氣桴日本路悠哉，皇明徵士迴天志，水府師儒勸學才。

單服但懷韓幹畫，重圍漸脫韃人災，珍寵知有瓊華字，讀罷躊躇感易催。<sup>60</sup>

到江戶以後，朱舜水所作的詩句雖然都是在遊後樂園時所寫下的「酒壚小詞」<sup>61</sup>，但卻正可反映其心境的轉折。1669年，朱舜水遊後樂園時，除了寫下知名的〈後樂園賦〉，當時心情愉悅的他更作了詩：

<sup>57</sup> 《朱舜水集》，〈遊仙詩·八〉，頁426。

<sup>58</sup> 見張廷枚，《國朝姚江詩存》，轉引自《朱舜水集》，頁428。

<sup>59</sup> 詩見原念齋，《先哲叢談》卷二，〈朱之瑜〉，載《朱舜水集》，頁636。

<sup>60</sup> 《新訂朱舜水集補遺》，〈朱舜水寄琴山井詩〉，頁244。

<sup>61</sup> 青山延于，《文苑遺談》卷一，〈朱之瑜〉，載《新訂朱舜水集補遺》頁258。

望處旗亭新構，竹裏茅舍人家，引來曲徑奇葩，鴻池諸白香茶。

醉倒渾忘法地，波查辟易欹斜，歲暮冬衣難典，酒錢且自賒。<sup>62</sup>

之後，德川光國又張宴環景樓，並在淺草川泛舟，此時人見傳(野傳，1638-1696)唱聯句，舜水續之曰：「山歛螺黛遠，高閣徹晴空。」<sup>63</sup>。從文字內容便可感受到詩的語調不再只有思念故國的情感，相反的，從他寫詩辭別琴山井及與人見傳作聯句的情形來看，詩在此時的舜水心中，除了吐露心境外，更多了一份文人間唱和的歡娛之情。

而從賦來看，朱舜水一生只做過兩首賦。〈堅確賦〉作於安南時期，當時是安南王遣人寫一「確」字來問，朱舜水了解國王此舉的用意，並舉了「堅確」、「的確」、「確論」等為解，後來國王便令舜水以「堅確」為題作賦。據鄭毓瑜的看法，賦的內容主要表達的是舜水不仕安南的決心。<sup>64</sup>

另一首賦則是在 1669 年時，朱舜水遊後樂園賞櫻，舜水將此行的過程以賦記之。舜水在賦的序文中提到此行「先後諸賢，徘徊瞻眺，悅目娛心，留連無已」<sup>65</sup>，而賦的內容便是描寫這種遊觀之樂。鄭毓瑜已針對這首賦作過詳細的分析，認為賦的主旨是王侯宴樂群臣而臣屬歌頌主上德業，而此時的舜水，其遺民心境已逐漸從亡國遺民轉變為盛世新民。<sup>66</sup>因此，比起在安南時透過被動地寫賦向安南王表明心跡，此時的朱舜水則是主動地將此行的過程與心情寫成賦，其中的差異清晰可見。

不僅如此，朱舜水至江戶後因為備受尊崇，不時有機會與日本

<sup>62</sup> 青山延于，《文苑遺談》卷一，〈朱之瑜〉，載《新訂朱舜水集補遺》頁258。

<sup>63</sup> 見安積覺，〈朱文恭遺事〉，載《朱舜水集》，頁628-629。

<sup>64</sup> 鄭毓瑜，〈流亡的風景—〈遊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註3，頁2。

<sup>65</sup> 《朱舜水集》，〈遊後樂園賦并序〉，頁428。

<sup>66</sup> 鄭毓瑜，〈流亡的風景—〈遊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頁15。

儒士們聚會，如人見竹洞(1636-1696)有次(約在 1666 年秋)邀舜水至葛東水竹深處，一行人同舟前往目的地。竹洞記下了這次經過：

是日也，天霽氣清，舟中或問中國之山水，或談西湖之幽賞。舟到牛島，與翁徐步入咏歸亭，荷花滿池，紫薇掩蔽，翁入鶯巢，登高風閣，欣然而樂，對案喫飯，酌酒隱醺。

由於朱舜水不太會喝酒，人見竹洞還問舜水是否平日不飲酒。舜水回答說：

僕弱冠，大飲，與少年公子群遊，...，先考戒之太嚴，爾來戒酒不飲。況又久遭亂世，無與可飲，今來此佳境，偶乘清興，不覺醉小甌耳。<sup>67</sup>

見此時的朱舜水已暫拋亡國之痛單純欣賞佳景，連已許久不喝酒的他都不免小酌一番。此外，約在 1669 年前後朱舜水赴友人之會，應友人的請求將此次的聚會寫成短文記之。文中寫下了湖邊在無人時幽靜的風貌以及人來之後杯觥交錯的熱鬧景象。不過，由於這篇短文是在事隔多年以後才寫下的，舜水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雖然「今復欲續此勝遊」，但又怕面對友人時會「無辭以對」，所以只好作罷。<sup>68</sup>

因此，不論從詩賦的內容或交遊情形觀之，都可感受出朱舜水至江戶前與至江戶後心境的差異。朱舜水最後十七年在江戶的生活並非只有昔人所強調的悲苦、孤忠的形象，還多了一種見到聖道將行的喜悅以及悠然自得的遊觀之情。

## 五、結語

「大儒」、「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民族英雄」，這些是

<sup>67</sup> 《新訂朱舜水集補遺》，〈答人見竹洞問〉，頁239。

<sup>68</sup> 《朱舜水集》，〈江亭餘興〉，頁509。

一般人所理解的朱舜水，然而這些也都是後人所給予的身分。當時的朱舜水絕對無法想像從未在清人統治下生活的他竟會成爲「清初五大儒」之一，更無法理解自己的抉擇與思想會在兩百多年後影響了日本明治維新與中國革命。然而，其實明亡以後的朱舜水具有相當平凡的一面，且與許多明遺民有相似之處。

明亡以後，朱舜水如同許多明遺民一樣面臨許多重要的抉擇。在面對殉國與否的抉擇時，朱舜水以自己未出仕而認爲沒有殉國的必要，同時在他心中更認爲積極爲「恢復」奔走遠比國亡以後消極的殉國來得更有意義。因此，選擇繼續生存下去的他一方面爲了保全頭髮衣冠，一方面爲了繼續抗清而遠走海外。起初他並未有長居海外的打算，但當發覺恢復一時無望後，決定寓居日本。在面對出仕與否的問題上，朱舜水秉持了「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的原則，他在明末雖有志於匡救，但因時事不可爲，因此一直到最後他都未任明朝官職。到了海外的朱舜水仍是以此爲原則，並對守禮十分堅持，也由此可以理解爲何他雖拒絕了安南王的請求，卻接受了德川光國的邀請。

因此，從本文的討論中可以發現，若拋開後人加諸的歷史光環，其實朱舜水與同時期的遺民相較是有不少相似之處的。在面對種種以生與死作開端的選擇時，背後其實隱含了複雜且多元的原因。忠君愛國絕非是他面對抉擇時的唯一選項，在面對抉擇時，中國士大夫的傳統、個人的信念等都影響了他的回應方式。

對於當時的朱舜水而言，面對這些抉擇時是無法想像結果的。但從結果論來看，朱舜水決定接受德川光國的邀請前往江戶以後，將他的生命帶進了一個新的境界，也使他的遺民生命與的其他明遺民有了明顯的區別。由於當時日本極力發展儒學的背景，加上德川光國與日本儒士們對舜水的敬重，使得朱舜水人生的最後十七年，心境不再只是背負亡國的悲痛，更多了一種見到聖道將行的喜悅以及悠然自得的遊觀之情。也因此可以發現，朱舜水的形象絕對不是單一不變的，然而這種心境上的轉變卻是學者們少有提及的。